

1534/21

牡丹江文史资料

第五辑

(工商财经专辑)

牡丹江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主 编：黄克俭

陶新初

副 主 编：史清琪

责任编辑：郑玉成

目 录

序.....	孙继昌 (1)
--------	-----------

行 业 史 话

牡丹江市工商沿革简况.....	宋树清 (3)
牡丹江市商会史.....	宋树清 (10)
漫话边城饮食业.....	吴明远 (23)
牡丹江市供销合作商业的演变.....	初胜利 王树森 (31)
建国前后牡丹江市朝鲜民族工商业.....	梁在华 罗正在 (44)
建国前后的牡丹江市纺织业.....	丁继荣 (49)
1、俄对牡丹江林业的掠夺.....	陶云国 (59)
建国前的牡丹江印刷业.....	李云斋 (63)
历史上的虎林商业.....	刘翰章 (68)
新安镇工商业的三十年变迁.....	吴德鹏 (73)

工 矿 企 业

镜泊春秋.....	李庆儒 (79)
天发东铁工厂.....	宋顺发 高立功 (104)
油房探迹.....	陈国礼 (112)
绥芬河啤酒厂八十年.....	周艾民 曹永顺 (118)
民国和日伪时期的东宁煤矿.....	黄青山 (125)

宁安县北火磨	于立本 张玉升	(138)
穆棱金矿的血泪	王广臣	(142)
穆棱煤矿话旧	王广臣	(148)
绥芬河宝成电灯股份公司	周艾民 曹永顺	(152)
日伪时期东宁修建的三条铁路	尹瑞盛	(155)
二道河子“老火锯”的变迁	吕振祥	(158)
日寇对牡丹江铁路的控制	卢润生	(166)

商 业 字 号

日伪时期牡丹江市主要工商号	范垂政	(173)
日伪时期铁岭河商工企业名号录	范垂正	(177)
银座通街寻踪	孟新舟	(178)
日伪时期的高冈号	范垂政	(180)
“国境商业都市绥芬河”	周艾民 曹永顺	(188)
德义轩饭店	张育生 年文瑞	(193)
恒元当	李永祥	(201)
鸿茂长商店的经商之道	张宗贷 李道全	(206)
日伪时期的“吉安里”	孙炎昭	(211)
台中大酒店的兴衰	于茂义	(215)

外 贸 口 岸

牡丹江边贸今昔	王辅权	(224)
三岔口早期的对俄贸易	邹化岐	(234)

财 政 金 融

建国前后的牡丹江财政.....	白玉聚 (237)
牡丹江金融纪略.....	李殿生 (245)
牡丹江历史上的税捐.....	税志办 (259)
旧币漫忆.....	陈国礼 (263)

工商人物

陈孝德简传	陈国礼 陈绍勤	(269)
“孙小辫”其人其事	王树本	(277)
理发世家话今昔	吴明远	(291)
王勋卿与志诚公司	宋树清	(308)
印刷沧桑五十年	赵洪经	(316)

商海拾贝

宁安县城早期商业楹联……………郭 军 (323)

牡丹江旧市场的“八个怪人”……………王玉莹 (331)

牡丹江地区米酒考述……………张呈文 (335)

国民的传统糕点——蜜果……………李文明 (342)

……………丁瑞林

前 言

孙继昌

牡丹江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这里资源丰富，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山水秀丽，素有“塞北江南”之称。东部和南部有725公里的边境线与苏联接壤，有绥芬河、三岔口、档壁镇、虎头镇等四个对苏贸易口岸，是祖国东北边陲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被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市和省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牡丹江市虽然只有50多年的历史，然而她座落的牡丹江流域却历史悠久，饱经沧桑。有闻名遐尔的唐代渤海国和清代的宁古塔。伴着历史的脚步，这里的工商业也随之产生、繁荣、发展。20世纪初，牡丹江成为中东铁路的一个小车站，开始出现了粮栈、油坊、烧锅、大车店等工商服务业的萌芽。1916年牡丹江形成第一条街道“兴隆街”，有30户商业买卖，并成为这一地区大豆、粮谷、木材、皮毛杂货等的集散地，四个口岸也相继开展了一些民间的对外贸易。到了20世纪2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发展，有了近代化的加工工业和产业工人。30年代后，由于图佳与滨绥两条铁路在此交汇，加之牡丹江市的成立，在工业、商业、金融、外贸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绥芬河已发展为有名的外贸口岸，各国商人云集，各国国旗飘扬，被誉为“旗都”和“国境商业都市”。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日益发展的需要，牡丹江市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根据全国和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要求，本着史为今用的原则，对牡丹江历史上的工商经济“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进行了积极的挖掘和整理工作，现经整理，选编出版了这辑工商史料专辑。

这辑史料，从某些方面展现了我市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军阀连年混战的形势下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发展、兴衰之路；反映了旧社会一些商工企业和实业家艰苦创办民族工商业的爱国之心和宝贵的经商治厂之道；也揭露了旧商人唯利是图，剥削工人，甚至有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沦为历史罪人的一面。当然旧商人企业家那套管理经营方式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经济所要求的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也有些经验教训可为我市的改革、开放和试验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年青的朋友也可以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深刻领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认清我国今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献身于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壮丽事业。在建国40周年的前夕，我们出版这辑工商史料，谨作为向伟大祖国母亲的一份献礼！

编辑出版着重于解放前的工商史料，我们尚属首次，在资料的筛选上也很不全面，不足以反映我市历史上工商经济发展的全貌。由于有的史料时间久远，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所限，肯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各界知情人士予以补充和批评指正。

在征集出版这辑史料中，得到了各县（市）、区政协、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少文史爱好者和知情者抢挤时间，挖掘整理，苦思笔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我谨代表市政协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牡丹江市工商沿革简况

宋树清

一、清代商业资本与殖民贸易

牡丹江市位于北纬44度35分，东经129度36分，海拔200米的盆地位置。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四周山峦起伏，犹如绵延天际的屏障；碧波闪闪的牡丹江，象一条银白色的锦带，沿着牡丹岭飞飘而降，蜿蜒地穿过牡丹江市区腹心。这座城市，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天然物产丰富，自然条件无比优越。

自古以来，中国东北各族劳动人民世代代繁衍生息，在牡丹江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创造文明财富。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有生产品交换的货币关系发生。经唐、宋到明、清，工商业已有了长足发展。

19世纪末叶，牡丹江市的前身七河镇，为吉林三边重镇宁古塔的桥头堡和军事要地。自明末清初设立驿站和伐木通道以来，这里一直是南经宁古塔通往省城吉林和沈阳、北京，北往三姓（依兰）、虎头，东去绥芬河、海参崴，西通海林、阿城、卜奎（齐齐哈尔）的商贩往来必经之路。随着站丁和家眷开垦农田，出现家庭手工业作坊，招待过往客商的店铺也应运而生。19世纪末，宁古塔的粮米加工、榨油手工业的操作有了重大改进。成衣铺、袜庄采用美国盛家公司的手拉脚踏两用缝纫机，使手工业生产

发生变革，特别是后来孙彦卿创立机械火磨的出现，商业资本迅即适应生产力发展，转化为工业资本生产方式。

当时七河受宁古塔影响很大。上商字号除坐地户外，多为宁古塔移设分号，经营杂货店、烧锅、油坊、酱园、豆腐房、豆芽铺、馒头铺、饭馆、客栈、木匠铺、铁匠炉、铜匠铺、纸房、皮铺、鞭杆铺、砖瓦窑、药房等行业，关内商品青布、绸缎、茶叶、药材与东北土特产参茸、皮张、木耳、木材和烟麻等往来贸易，货商络绎不绝，店铺林立，小商云集，商品市场久盛不衰。

在帝国主义联合发动瓜分中国侵华战争的屈辱年代，沙皇俄国迫使清朝政府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签定密约。于1898年开始在中国东北境内“借地筑路”。1902年2月5日，哈绥线火车通车，货运开始。座落在现今太平路文化宫附近的牡丹江站是东清铁路主干线，从海参崴进入绥芬河横贯满洲里的东部线一个主要车站。这里是四通八达，构成南北水旱两路和东西铁路十字交叉点。沙俄凭借东清铁路沿线“租借”地区的特权，加紧进行掠夺式抢购粮食作物的筹备活动。哈尔滨西伯利亚洋行在牡丹江建设分行，派出买办(人称洋帮)宋志清来到宁古塔联络经营油坊业的地方绅商胡子风，广为征购大豆、小麦、燕麦等农产品。开始胡子风把征购大豆集中到七河，再用渡船、爬犁运到江北车站。自此，大豆等粮食源源不断地涌入牡丹江站，并通过牡丹江站运往国外，一个掠夺式殖民贸易开始了。牡丹江站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吞吐大豆、小麦等粮食的集散地。

牡丹江站开埠初期，站外“租借地”范围仅有几户人家，沙俄围绕着车站建起几幢石基红砖洋房。当年车站洋行兴盛，洋货居奇，除俄商西伯利亚洋行(商民简称“西比利”)，英商华英公司，法商利丰洋行，丹麦宝隆洋行和日本三井、三菱接踵而至。沙俄依靠特权，由商务代办所制限大豆价格，免除关税，开始控制牡丹江城乡经济命脉。西比利夺得了大豆廉价市场，谋取

国际市场高额利润，换取军火，以挽救本国经济危机。并且返回来在简易洋行抛售剩余商品（多为布匹、绸缎、毛毯，搪瓷、洋烟、洋蜡、洋火、洋袜子和化妆品），大量收购毛皮和山产品。

1902年秋，在牡丹江火车站的南下坎（现在永安街北头）的田野里，出现了一座四周土围墙围着一片青砖瓦房，布满粮囤（土粮仓）的大院套。这便是胡子风创建的第一家代理粮行——东发祥粮栈。第二年又从江岸敷设一条以大院为中心地，连接火车站货运站台的小铁轨，加快水陆运输的效能。从此，粮谷转运中心从七河镇移到牡丹江站。大豆商品化经营，周转快，所以东发祥在近火车站的地方扎下了根。它吸引了远近客商纷至沓来。到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年初，除东发祥以外。还有由海参崴华商经营的长发栈，海林绅商王翠亭移杜经营的西盛栈兼油坊，七河坐地户王福胜与通事侯福臣合伙开设的福增和兼烧锅，成为当时四大家颇具规模的专业性粮栈，专门为俄德等外商收购大豆等粮食作物。

这四大家各自独守“城池”，又都兼营代客商买卖、保管粮食的代理店、大车店、客栈或油坊。小贩摊商和挑担农民也从七河涌入牡丹江站。第一家做小买卖的叫顾学（工棚人称他为顾大爷），搭棚盖屋，开小食品杂货铺。后来四大家有的开始兼营杂货，并修建砖瓦房经营商品，开杂货店。在江滨渡口，有远近车马、大小船舶和沙俄货轮穿梭江心，长长的木排拢岸，碧绿的江畔上点缀着黄白相间的席棚，供人们小憩的茶座小吃，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景色壮观，逐步形成商业市场。

二、民国年间工商业的发展

民国年间，于牡丹江站下坎逐渐形成了繁华的街巷，称华街，商户叫它兴隆街。这个街巷共有30多户商民和渔猎人家。其

中有十家大商号，最大有八家，人称“十大户、八大家”。有原来西盛栈改号西盛泰；谷怀贵从海林来牡丹办的大成兴；七河赵连奎迁来的合成东；宁安商会长范喜珍之弟范凯轩开设的庆升东；徐俊秋开设的源盛东；海林王象平开设的德增永；于明福开设的和顺兴；霍家馆子（兼客栈、大车店）和大兴栈。另两户指四海园（双幌饭馆）和德盛园。其它有小食铺、茶馆、药房、浴池、理发和小铺、摊贩。

大商户都有宁安、海林等地底柱，总柜头指掌牛耳。各家帮派抬头，开始形成了山东帮、直隶（河北）帮两大帮派，直接影响各家经营活动。在外地的商号往往在牡丹江选定替身（代理人）设分号，以身股鼓励积极经营，分得厚利再合股，然后独自经营。这差不多是一种经营惯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条约》，据《清史稿》第八册所记载《附约》规定：“东清铁路，横道河、山市、海林、牡丹江四商埠”为“开放商埠”。1907年7月30日，日俄密约又把宁古塔以南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哈尔滨日商三井、三菱的魔爪开始伸到牡丹江站。日、俄掠夺竞争，俄商西比利输出大豆推首位，根据尼·斯坦裴尔德：《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统计，1911年经牡丹江站运出：“大豆年计高达3408.9万普特”（一普特为16.38公斤）。因而，日本财团的掠夺目标主要放在木材上。

1915年，日本大资本家“官商”在牡丹江投入资金3,500万元哈大洋“拓展木材业”。在牡丹江站建立联合出張所（驻在所）和运转站，以资本优势“签订合同”和“合办”形式控制中国木材业主，并且单独经营牡丹江木材公司。1915年一年，就运出原木150万石（一石合10立方米），等于1500万立方米；1918年从牡丹江站发出原木4,000货车，共30万吨；1926年一年达30,000本（根）。随着木材业的开发，1918年牡丹江站出现了最

早一家拥有先进的机械设备的华人木材加工厂。创办人是王勋卿，为合资志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民族资本家，用40万元哈大洋资本同拥有3,500万元的日本财阀相抗衡。1920年，牡丹江站工商业发展到20余户。到1930年发展为190余户，全部资金总额为104万银元。最大仍是四大家：三益隆、益成永、公济号、恒盛泰。

到1931年9月，人口发展到3,511人，444户。其中汉族3,200人，380户；朝鲜族300人，60户；日本人11人，4户。

三、伪满时期的民族工商业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掠夺和强占我东北自然资源，对我国民族工商业排挤、压制，至使其一直没有正常地发展起来。日本财阀首先对大豆粮谷和木材进行全面控制，不到半年时间从牡丹江站输出大豆83,290吨。以250万元巨资投入木材加工业，到1938年“年生产总值达8,399万多立方米”，输出总额达4,000万日元。为实现侵略野心，市政建设明显划分日本人、朝鲜人、满洲国人的区域，在收税比率上中国人与日本人相差极悬殊，比日本人高出百倍。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工商业的商工金融合作社。日本资产高岗号、亲和贸易公司、福昌公司、鸟羽洋行、中寅商店、光武商店、伊藤忠商店等专营批发业务，向中国人大宗信贷货物，并指令中国商会并入商工公会。

1938年6月12日，作为日本“国策生产工业”的桦林“满洲巴鲁布株式会社”（见照片1）建成投产。这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在牡丹江创建的第一个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人造化学纤维和塑料工业，预定年产量为5万吨，产值150万元。由此，日本殖民工业资金逐年上升：

1936年（伪康德三年）2,800万元

1937年（伪康德四年）1,860万元

1938年（伪康德五年）3,480万元

1939年（伪康德六年）5,000万元

日本财阀工业资金，以1937初的1,000万元计算，中国人的工业资金总额仅有29万元，不及日本财阀资金的3%。佐藤钟次郎：《最近牡丹江事情》写道：“资金总额日满系大有差别，满系仅有3%乃至4%”，“日系资金完全压倒了久在此地和新来的土著资本……”。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为阻止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力图使其处于经济上落后状态，竭力阻碍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详见下表：

1938年中日一般工业资金对比表

工业别	户 数		资金总数（元）		备 注
	日本人	中国人	日 本 人	中 国 人	
					“满铁”巴布鲁未列入。
砖 瓦	4	9	650,000	190,000	
铁 工 业	4	4	810,000	10,000	农具，机械部件。
粮谷加工	3	1	3,150,000	23,000	
酿 造 业	4	5	95,000	47,500	
油 坊 业		9		56,500	
印 刷 业	6	1	198,500	1,000	全市26台印刷机，中国人占二台。
其它工业		3		6,200	小苏打、面碱。
总 计	21	32	4,903,500	334,200	

1938年，牡丹江市人口已逾10万，最大的民族工商业如志诚

公司、满大制粉厂相继被日本资本集团吞并。日本人一时顾不到的行业，稍有发展苗头。如哈尔滨道外新世界来牡分设大世界，于1938年12月1日在现东一条路牡丹江旅行社开业的西式餐厅，楼上是迎宾、举行会议和婚典的大礼堂，楼下开设浴池，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被限定在非近代化生产领域，使中小工商业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行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市工商业1940年增加到5,900多家，共98种行业。其中：日本人、朝鲜人经营的2,400户，中国人经营的多半是中小工商业和摊床小铺约3,500余户。全市资本总额为2,200余万元，流动资金3亿元，而中国人资金总计只有100余万元。各种税：卖钱税、纯利所得税、资本金所得税、地方附加税、印花税等，名目繁多。1941年7月25日，《物价停止令》颁布后，民族工商业极度凋零，工商号纷纷倒闭，经济生活一片凄凉。一部分商户转为配给店，余下800余户顶个门面。日伪严酷的经济统制，使民族工商业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牡丹江市商会史

宋树清

牡丹江市商会是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诞生于20世纪初。当时的牡丹江作为清政府尚且无力实施地方行政权的开放商埠，商会显然带有“官商一体”或“半官半商”的色彩，但基本上保持了“官督民办”的性质，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在政治上作为清政府地方政权的补充，维护主权，挽回利权，以法人团体面目与俄、日资本集团相周旋。同时，在一定历史时期，牡丹江商会站在商民立场上同俄、日资本家进行“商战”的斗争，维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总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和政治上的两重性，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有支援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积极一面，也有消极破坏性的一面。但纵观牡丹江人民群众抵制俄、日帝国主义掠夺和反侵略的历史，牡丹江商会对推进社会生产力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一、建立商会的历史背景

牡丹江市自明清以来，就是山产品、木材运输的枢纽。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水陆交通的便利，早在明末这里就有伐木通道和驿路。清顺治年间开始在七河屯（今牡丹江市区江南）加驻兵防，建驿站，设卡伦（关卡），随着站丁家眷拓荒，农业、手工

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七河镇达到3万人口，近200户手工业和商家，开始形成同乡会和行会组织。1900年七河镇江北建立牡丹江站（见照片2），强化了牡丹江特殊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的重要地位，成为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转运中心。俄、日等资本势力入侵，相继成立商业机构。中国商人也纷踏牡丹江站设立自己的商行。

1901年2月5日，从哈尔滨至海参崴海港的铁路线开始货物运行，沙俄加重了掠夺大豆、小麦等大宗农副产品和推销商品，在牡丹江站设立东清铁路商务代办所的官方机构和西伯利亚洋行，聘任侯福臣、刘财为通事。从哈尔滨路局派来一名帮办（商民叫洋帮）兼通事（翻译）宋志清，大量收购大豆和“大批招募山东苦力”开垦农田，种植大豆，并把大豆经由海参崴运往德国市场，这时牡丹江站已形成一个吞吐大豆农产品的集散地。

1902年，在七河镇经营大豆购销生意的宁古塔（今宁安）绅商胡子风在牡丹江站兴土木，建粮栈。与此同时，海参崴华商，筑路时当掮客和通事发家的王福胜与海林等地商人纷纷到牡丹江站建行栈，开杂货店，牡丹江站（现市文化宫广场）下坎出现四家粮栈“八大家”和“十大户”。哈尔滨西伯利亚洋行买办吕松泉、英商华英公司、法国利丰洋行、日本三井物产会社和丹麦宝隆洋行接踵纷至，常住牡丹江站设分行或代理商行。

随着大豆贸易市场的发展，沙俄殖民掠夺不断扩大，商务机构和西伯利亚洋行不断对大豆压价，使民族资本家同俄国殖民官方机构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利害冲突。随着地方商业的不断增多和中国商人与外商斗争的需要，在中国商人之间逐渐形成了为维护商人做买卖的民间商会性组织。在商会组织下，中国商人控制了大豆，迫使铁路商务代办所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然而，东清铁路当局不承认铁路沿线清政府的管辖权，只承认商会法人团体，特别是1907年从哈尔滨、横道河子到绥芬河各站俄人成立自

治会，强施地方行政权利，引起各站民族资产阶级拒税抗捐斗争。这就引起了清政府对铁路沿线的民间商会组织的关切。

二、清代牡丹江商会的诞生

1904年（光绪30年），吉林省铁路交涉总局横道河子分局牡丹江分所成立，由分局授权胡子风继续以民间团体名义与铁路联络交涉事宜。胡子风把十几家粮行、杂货店统一在东发祥客棧。打破宁古塔的山东会馆、直隶会馆、山西会馆等行帮的帮派组织形式，效仿宁古塔公议会，设立公议所。主要是胡子风一人把持，平抑钱价，指掌行情，与外国资本掠夺相抗衡。

1908年12月，牡丹江商务分会正式成立，归属吉林省商务总会。会长胡子风，后来增补副会长王福胜。

1909年（宣统元年）5月，遵照农商部委札改称牡丹江商会，在王明福的三间房正式挂出了牌子。

胡子风，宁古塔油坊业绅商，1902年来牡经销大豆，开设东发祥粮棧。

王福胜，东清铁路雇工，筑路时招雇大平发财，与通事侯福臣、刘财等合开烧锅兼行棧。

滨江道尹兼吉林省交涉总局局长，通过横道河子交涉分局设立牡丹江分所，为维护行政和司法主权，正式授权牡丹江商会代行交涉和地方行政事务的权力。授予王福胜顶戴花翎，商会大堂有“虎头牌”，两排黑红棍和一杆刑鞭，有开打人犯20大鞭棍之权限。这时商会已经变成官商一体的“官助民办”性质的机构了。

三、东北军阀统治时期的商会

1、商会创立的商团组织